

The collected works about fine ar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en universities

十院校美术考古研究文集

罗宏才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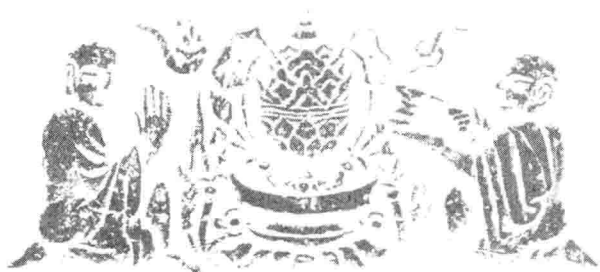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美术学”建设规划项目

十院校美术考古研究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about fine ar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en universities

罗宏才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院校美术考古研究文集 / 罗宏才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671-1394-7

I. ① 十… II. ① 罗… III. ① 美术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 K879.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152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章斐
责任校对 黄剑波

十院校美术考古研究文集

罗宏才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2.75 字数383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394-7/K·126 定价: 60.00元

绪论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考古工作坊课题项目负责人 罗宏才

学术革新、信息勃发、数据积聚以及不断的问题生成与智慧集结……多量的变化伴随着学科的亢进与裂变,传递出急促的时代需求。

适应这一需求,年轻而又厚重的美术考古学科亦频频显现积极的躁动。尽管目前国内对这一学科的渊源、历史、归属、性质、方法、趋向等种种问题尚存在着纷纭的议论与不同的思辨建设注入,尽管这种积极的躁动难免携带一些负面的因素或者存有可能在以后发展趋向上将会被扬弃、批判的成分。

着眼于探索、思考以及一流学科建设的需求,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审慎确定设立美术考古工作坊课题项目,并期望通过这一项目的逐步实施,能对美术考古教学、研究和成果转换、数据积累、信息服务以及与相关学科实施有机互动等方面有所助益。

接受上述背景的影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罗宏才教授有幸负责这一课题项目的具体实施。按照课题项目的要求以及工作计划,从2012年开始,全体课题组成员相继进行了积极多样的实践投入与探索研究。

于是,选择一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理区域,集中围绕若干亟待解决的教学探索与学术问题,会同相关高校与科研单位的教学、研究力量,通过田野调查、信息交流、资源共享、集中研讨、汇聚成果等系列方式来努力实现课题设置时的初衷与目标,便成为课题组2013年至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具体而言,经过长达年余的积极筹备与紧张实施,2013年12月24日,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考古工作坊课题组发起,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成功举办了包括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兰州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院校在内的

“十院校美术考古学术论坛”。

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院校硕、博士生共40余人,提交论文共30余篇,其中有20余篇论文在论坛宣读、讨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相关报道称,这次论坛是“在当前国际化、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立足上海国际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学术碰撞与经验交流,推进中国高等院校美术考古学科建设,为美术考古专业教育扩充知识储备、提升学术高度、培养新生代学术人才、促进优秀研究成果交流、增强学术科研氛围”的一次盛会。

兰州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以及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等院校的参会者更普遍认为,整合相关高校与科研单位的研究力量,打通院校之间的科研壁垒,通过一个课题,围绕一个学科,选择一个区域,聚焦相关问题,实施多元探讨与立体互动,进而达到寓教学、科研于一体,合力完成责任分担、资源共享、信息共存的目的,是此次论坛的显著特色,也反映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积极探索、戮力实施学科提升的勇气与心力。

对位课题要求以及预拟工作计划,为集中展示此次论坛成果,经主编统筹,审慎策划,课题组特意在30余篇论文中精心选择出18篇论文,分别归类于综合研究、佛教艺术研究、汉唐五代壁画研究以及田野调查与美术考古研究四个主题,并在主编及编辑组同人多次认真修改以及反复校对的基础上,最终结集成《十院校美术考古研究文集》这本著述,且在2014年8月交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客观地说,这本30余万字、包涵300余幅图的《十院校美术考古研究文集》,虽然论题不同,撰写者的学术水准与教育背景各异,研究深度、广度与品质趋向亦参差不齐,但却明晰表达了围绕一个区域,聚焦相关问题,从大区域、大时代到小主题、小纪年,多维关照,相互链接,纵横挥发,逐层剖析的鲜明主旨特征,较为集中地传递出目前中国美术考古学界所不期发散的基本信息,反映出一个新兴学科在严肃、热烈的学术氛围中积极进取、戮力革新的节奏与心声。

其中上海大学罗宏才的《唐“石台孝经碑”相关问题的观察与讨论》一文,聚焦西安碑林碑石区群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代表性名碑——唐石台孝经碑,得益于论者长期工作于西安碑林的积累与感受,通过田野调查、文献支持、图像比较、史线勾勒、环境复原等方式,首次对雕凿于唐天宝四年(745)的石台孝经碑之雕造背景、设计风格、碑名源流与建筑环境的更易以及维修保护和不同历史环

境下诸种拓本的流传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与研究。其所立足唐《石台孝经碑》主体阐发的“天宝样式”概念,首次提出在同时期宗教艺术之外,还有另一种具有皇家意味的艺术样式,它们共同构成支撑盛唐艺术的主脉,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与罗宏才的研究指向颀颀,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董广强、兰州大学魏文斌的《陵墓与佛窟——麦积山第43窟洞窟形制若干问题研究》一文,同样得益于长期工作于麦积山石窟的基础与优势,在多次田野考察以及掌握第一手数据、图像与文献资料的前提下,论者围绕麦积山石窟区群奇葩——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墓窟,密切对位同时期地面墓葬整体建筑布局进行比较分析,对该窟外檐建筑的功能、性质和该窟中室、后室的基本形制、功能以及造像配置、风格特色、寓意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研究。着力提出西魏时期一种具有皇家意味的高层级特殊佛教艺术实例对麦积山石窟所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所谓“乙弗氏样式”命题的提出,丰富了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样式类型,因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此外,赵晓星的《莫高窟第361窟与第14窟之关系——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十》、高海燕的《莫高窟舍身饲虎与睽子本生组合初探》、孙晓峰、曹小玲的《麦积山127窟净土图像研究》、宋莉的《北魏景明年间长安佛教石刻造像研究》等论文,则集中围聚佛教艺术这一显学主题,通过不同角度对讨论主题进行了有益的阐发与剖析,很多层面有突破性的推进。

与以上诸家区别,沈琍的《陕西富平东石村石人的调查与研究》、于蒙群的《解州关帝庙明代铁质文物与山西金火匠人群体》等论文,得力于田野调查所获一线资料的支持,并注意链接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一定意义的探讨。张长虹的《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唐代〈八骏图〉绘画题材研究》、殷晓蕾的《图像的复制、传播与流变:俄藏黑水城出土〈贵人像〉研究》,则注意到选题的推敲以及剖析角度的新颖与别致。李思洋的《从栏杆形制看〈唐僧取经图册〉的时代属性》,还从建筑中栏杆形制入手着力进窥美术图像的艺术内奥,显示出她在历史与建筑学教育背景规制下刻意追寻研究视角的鲜明研究个性。

涉及参与论坛的整体人员结构,以及单位院校所提交的论文数量而言,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显然占有明显的优势。

无疑,这一优势的出现,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近年来精心实施一流学科建设的结果,更是美术考古工作坊研究课题全体参与者直接助力的结果。

不惟如此,参与此次论坛的新崛起的一批硕、博士研究群体基本呈梯队式展现,表现得尤为突出。像博士生黄剑波的《“备茶图”考——以墓室壁画为观察中心》、龚晨的《汉墓壁画色彩区域性研究》、刘明虎的《北周长安石刻菩萨造像组玉佩纹样研究》;硕士生付维鸽的《半坡“人面鱼纹”的内涵再探讨》、王月的《汉画像石中女性图像研究》、施政的《傅山“四宁四毋”论之剖析》、郑辉的《王子云洛阳民生写生图研究》等论文,不管是选题角度、研究方法,还是开掘深度、研究品质等,都有不俗的表现与积极进取的趋向,反映出十院校新生代美术考古研究梯队已经凸显的强劲实力,也说明整个中国新生代美术考古研究梯队实际蕴藏着亟待开发或亟待提升的雄厚潜在优势,令人可喜可贺。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此次论坛所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并不刻意掩饰其中所存在的粗疏、生涩以及部分割裂等问题。客观地说,有些论文的论题还需调整、商榷,某些议论观点还需新资料、新理论的不断出现来逐步加以检验、调整与补充、完善。而高等院校与相关科研单位在论题指向、研究方法等方面,实际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期待实施进一步的交融与互通。

但不管怎样,从总体而言,课题所设定的基本要求已经达到,论坛所产生的基本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同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的进步,这种基于一个有意味的研究课题本体而有机凸显的院与校、师与生以及图像与文献、区域与时代、田野与课堂等多元层面上通过交流、碰撞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还将会逐步显现并不断裨益于社会与学术。

因此,总结以往成功或者不足的经验,规划下一步的研究进程,确定新的研究主题,寻找新的研究方法,进窥新的学术区域,将是我们目前所最恳切的期盼,也是在这本通过共同努力而最后完成的拙著出版之际,我们要特别予以阐明、表述的真实意旨。

目录

Contents

综合研究

唐“石台孝经碑”相关问题的观察与讨论	罗宏才	3
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唐代《八骏图》绘画题材研究	张长虹	32
图像的复制、传播与流变:俄藏黑水城出土《贵人像》研究	殷晓蕾	52
从栏杆形制看《唐僧取经图册》的时代属性	李思洋	66
半坡“人面鱼纹”的内涵再探讨	付维鸽	94
傅山“四宁四毋”论之剖析	施政	106
王子云洛阳民生写生图研究	郑辉	119

佛教艺术研究

陵墓与佛窟——麦积山第43窟洞窟形制若干问题研究	董广强 魏文斌	135
莫高窟第361窟与第14窟之关系——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十	赵晓星	157
麦积山127窟净土图像研究	孙晓峰 曹小玲	167
北魏景明年间长安佛教石刻造像研究	宋莉	182
莫高窟舍身饲虎与睽子本生组合初探	高海燕	200
北周长安石刻菩萨造像组玉佩纹样研究	刘明虎	218

汉唐五代壁画研究

汉墓壁画色彩区域性研究	龚晨	243
汉画像石中女性图像研究	王月	261
“备茶图”考——以墓室壁画为观察中心	黄剑波	268

田野调查与美术考古研究

陕西富平东石村石人的调查与研究·····	沈 琍	305
解州关帝庙明代铁质文物与山西金火匠人群体·····	于蒙群	332
后记·····		351

综 合 研 究

唐“石台孝经碑”相关问题的观察与讨论

西安文庙大成殿遗址^①之后、碑林之前正中碑亭内立置的唐天宝四年(745)“大唐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注孝经台”碑,又称“石台孝经碑”,简称“石台孝经”、“孝经石台”^②、“石台”^③等。

全碑用上好细质青石雕凿而成,选石考究,工艺精湛,书法秀美,高达620厘米,为享誉中外的名碑,亦为迄今所见唐代碑石之中最为雄奇的典范,具有“风骨巨丽,碑版峥嵘”^④的风姿和“老劲丰艳,如泉吐凤,为海吞鲸”^⑤的气度(图1、图2、图3)。

对于此碑的观察与讨论,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书法艺术及金石学范畴内“以石台孝经石刻校正刊本经注之伪”^⑥等方面。近代以来,由日本及西方学者发端,开始逐渐有考古、美术、设计等学科领域关注其雕造背景、造型结构、纹饰源流等方面,但多属表象的观察与粗率的记叙。至于碑名源流、雕造样式、设计风格、建筑环境、拓本流传、历史沿革、保护维修等相关问题的系统阐释与综合分

-
- ① 西安文庙今易为西安碑林博物馆,庙内原有面阔七间、重檐歇山顶大殿,已毁于1959年雷火,其建筑基址在其后亦被拆除。
- ② 参见西安碑林藏金正隆五年(1160)刻《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曹谊撰文,郭孝忠书丹。文记:“宣圣殿后,旧有玄宗序注孝经石台并文宗群经碑院一区。”
- ③ (唐)李隆基《答李齐古石台孝经表批》:“特建石台,以垂百代之则”。收录于《全唐文》卷37。
- ④ (唐)张彦远《法书要略》卷6引(唐)窦泉《述书赋下》:“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
- ⑤ (明)赵崡《石墨镌华》评《石台孝经》:“老劲丰艳,如泉吐凤,为海吞鲸,非虚语也。”《石墨镌华》所论与张彦远《法书要略》卷6引唐窦泉《述书赋下》所谓明显相关。
- ⑥ (清)瞿中溶编、缪荃孙校定:《嘉业学堂丛书·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民国二年(1913)嘉业学堂刊,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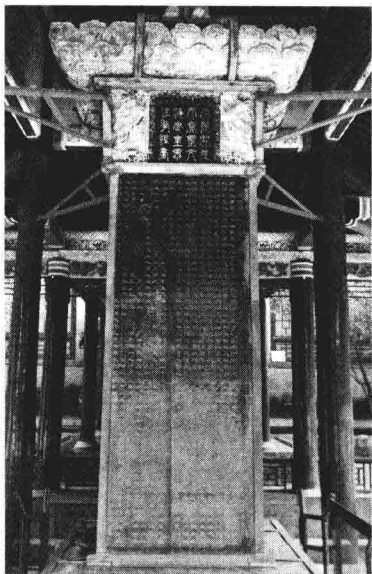


图1 唐石台孝经碑正面



图2 唐石台孝经碑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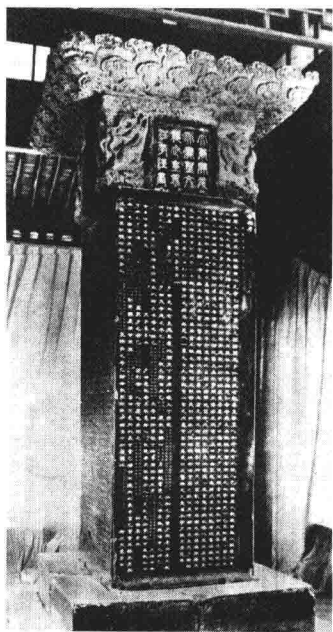


图3 石台孝经

(采自李域铮:《西安碑林书法艺术》,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析,则鲜见涉及。

此类遗憾,实与曾经“伟冠一时”^①的西安文庙建筑规制,以及属于盛唐典范、一派“丰劲,气象伟如,望之心慑”^②的“石台孝经碑”相较,存在有较大的差距,亟须弥补完善。

因此,本文拟在系统田野调查以及收集所获新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对以上诸问题作初步的分析,以获得相关识者的批评与指正。

一、雕造背景、设计风格与“天宝样式”概念的提出

欲考究“石台孝经碑”雕造背景、设计风格等相关问题,须先对此碑基本形制与艺术内涵作初步观察、描述。

按此碑碑顶为庀殿式,自下而上,有三层逐次累加、不断外伸的仰姿高浮雕卷云纹组合,形成巨大的翻覆状云盘,支撑起庀殿式主体。其分别作7、8、9朵三个系列,具有整体体量逐渐增大、渐次收分、比例和谐的效果。每一朵云纹,皆健硕饱满,翻覆向上,起翘弧度、力度特甚,促使庀殿式整体呈现雄大健劲的倒立覆斗形,营造出巍峨高耸、庄严神秘的视觉效果(图4)。

此碑碑身,系四块长方形青石块面两两凑集组合而成,“为碑凡四”^③。整体呈长方形四面柱状体。四面碑体内容按顺时针方向设计规划。实测每面宽120厘米,其中3面镌刻由玄宗李隆基(685—762)隶书儒家伦理学经典著述《孝经》,每面各18行,行50余字(图5)。《孝经》之外,最后一面分为上下两段,上刻李齐古表文正书9行,李隆基批答行



图4 碑林唐玄宗御注孝经碑局部
(采自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九辑》,法藏馆,1940年,第13页)

① 西安碑林藏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学记》(附刻永兴军中书札子),李栗记,潘师雄书,碑文有:“庙学之成,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冠一时。”

② (清)汪中(字容甫,1745—1794)《述学·述学别录》“唐元宗《鹤鸣颂》跋尾”条,广韵楼藏本,民国志古堂刻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

③ 佚名:《古文孝经指解》,见清《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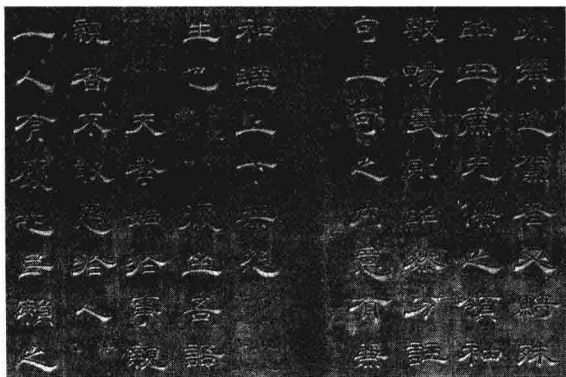


图5 石台孝经碑局部文字

书3行；下刻参与此事诸臣衔名4列。

碑身正面顶部中间，刻有方形碑额，额篆“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16大字，作4行排列，每行4字，出太子李亨（711—762）之手。额篆之外，有方形界栏，浅浮雕云纹图案一周；额篆之外方形界栏外两侧，则对称雕造瑞兽、

云纹。究其意匠，皆当等同碑顶云盘之制。

此碑碑座，作三层阶梯状，与碑顶三层仰姿高浮雕卷云纹组合数字吻合。座之四面，分别设计有以浮雕、线刻等技法制作的蔓草、瑞兽、卷云等图案，意匠亦与碑顶云盘之制吻合。

如是状况，戊子（1948）冬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曹仲谦撰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概况说明书》“石台孝经”条有精彩描述：

（石台孝经）由四石合成一方塔形，上覆顶冠高一公尺一寸，出檐约三公寸，浮雕卷云蟠螭擎攫飞腾，极其生动。下叠三台，层高三公寸许，每层平雕蔓草狮子，精巧迥丽，明润莹澈，可称石刻图案画中绝品。

相关情事，清初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一文有详细剖述。文云：

（石台孝经碑）今在西安府儒学。前第二行题曰：“御制序并注及书”，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劝题额。”其额曰：“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后有天宝四载九月一日，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柱国臣李齐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书三十八字。其下有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晋国公臣林甫、光禄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书弘文馆学士上柱国渭源县开国公臣李适之等四十五人姓名。^①

①（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两淮马裕家藏本。

至于此碑刊刻经过及题名诸臣考证,则见陈财经《“石台孝经”刊刻经过及题名诸臣考》^①一文详细考释。

前文提及,“石台孝经碑”雕造于唐天宝四年(745),主持雕造者为当朝天子李隆基。碑文载儒家传统经典《孝经》,隶书,亦李隆基所为。盖神龙元年(705)以至开元元年(713),短短八年半的光阴,朝廷多事,政变频仍,帝座四次更易,宫闱争斗不绝。即使以临淄王身份起家的李隆基本人,亦连续经过联合万骑果毅陈玄礼等发动兵变,杀伯母韦皇后与安乐公主,继而再诱杀左、右羽林将军,弑姑母太平公主并逼迫其父睿宗退位等种种政治波澜。

此类举动,以天经地义^②的孝道准则衡量,显然是背道忤逆的。故在李隆基心目中,尽管他的上台浸透着血腥与叛逆,但登上宝座后的帝主心态,却不能容忍类同旧日的血腥与叛逆再度发生,他需要四海之内的普遍臣服,更需要营造唐祚万世的最佳升平环境。于是,传统《孝经》所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③与“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以及“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④种种训教,便适时进入他的视野。在李隆基看来,推行“以孝治天下”,这符合他君临天下、四海一统的利益诉求。

因此,在矛盾、复杂的心境中,彰显孝道,期望建构新的君臣规制,遮蔽、淡化弑亲历史并希望借《孝经》经典大兴教化以维护现有统治,“志在于升平”^⑤,于是便成为李隆基的不二选择。

《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开元十年(722)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743)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又《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下》载,天宝三年(744)十二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又《新唐书·卷二百·元行冲传》载:“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

① 陈财经:《“石台孝经”刊刻经过及题名诸臣考》,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二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② 《孝经·三才章第七》:“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③ 《孝经·孝治章第八》:“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鰥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④ 《孝经·天子章第二》:“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⑤ (唐)《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6页。

官。”凡此种种，皆是当时历史背景的微妙写照。

受限于上述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于是才有李隆基“御注孝经”与“特建石台，……以垂百代之则，故得万国之欢”^①的壮举，以及太子李亨追随乃父，亲篆碑额以示“孝道”的微妙表现。

与之呼应，天宝四年（745）九月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李齐古（712—756）便特《进御注孝经表》，宣称：“臣闻《孝经》者，天经地义之极，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为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没，后贤所注，虽事有发挥，而理甚乖舛。伏惟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睦孝理，躬亲笔削。以无方之圣，讨正旧经；以不测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习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学王化所先，《孝经》圣理之本，分命璧沼，特建石台。义展睿词，书题御翰，以垂百代之则，故得万国之欢。”

李齐古的奏章，畅言孝道，并“特建石台”具体落实，自然博得李隆基的欢心，他随之批答行书，诸臣亦因之接续题名。它们作为李隆基推行孝道治理天下统治主题的系列之一，理所当然要依附李隆基“御注孝经”主体，从而构成“石台孝经碑”雕造问世的基本历史背景与全部碑石内容。

这样复杂微妙的历史背景以及受限于皇家的等级规制，促使“石台孝经碑”自然成为唐代碑石的最高典范。其孤耸高标的地位与催人震撼的视觉艺术效果，虽借助于皇家层级的一座高大石碑而得以永生，实与有唐一代最高等级碑石建造模式、镌刻内容需求以及屋顶建筑造型样式、气韵完全吻合，为当时流行风尚。究其示例，比比皆是。如寻找规律，整合分类，我们至少可获得以下七种感受：

（1）以庀殿式碑顶论，如唐乾陵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唐天宝三年（744）李林甫撰文，徐浩书丹“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敦煌藏经洞发现唐报恩经变相图中的庀殿顶图像^②；陕西户县草堂寺唐鸠摩罗什舍利塔；长治唐天祐四年（907）天台庵大殿等，皆可与之清晰比对。

同时可以清晰看到，至晚在天宝年间，高等级的碑石顶部设计，开始仿照唐代流行的屋顶起翘翻覆样式，出现了新的样式。

为方便了解石台孝经碑庀殿式碑顶之渊源关系，兹辑六种相关示例列表予以统计分析（表1）。

①（唐）李齐古：《进御注孝经表》，收录于《全唐文》卷377。

② 参见马炜、蒙中编著：《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绘画珍品——西域绘画·7（经变）》，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4页。绢本，设色，纵177.6厘米、横121厘米。